



学术名家文丛

谢本书学术文选

谢本书 著

雲南大學出版社
雲南人民出版社



学术名家文丛

谢本书学术文选

谢本书 著

雲南大學出版社
雲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谢本书学术文选/谢本书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2015 重印)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
ISBN 978-7-5482-1857-9

I. ①谢… II. ①谢… III. ①西南地区—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368 号

出品人: 周永坤
统筹编辑: 柴伟 陈曦
责任编辑: 李兴和
责任校对: 严永欢 和六花
封面设计: 郑治

书名	谢本书学术文选
作者	谢本书 著
出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网址	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9.875
字数	315千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2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482-1857-9
定价	60.00元

《云南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纪恒 赵 金 高 峰

副主任委员：钱恒义 张瑞才 陈建国 陈秋生

委 员：杨 毅 范建华 任 佳 李 维 张 勇

张昌山 王展飞 何耀华 贺圣达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赵 金

副主任：张瑞才 张云松 张昌山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光 王展飞 尤 中 朱惠荣 伍雄武 伏润民

任 佳 刘 稚 刘大伟 汤文治 李红专 杨 毅

杨先明 何 飞 何 明 何耀华 邹 颖 张文勋

张桥贵 陈一之 陈云东 武建国 范建华 林文勋

和少英 周 平 周永坤 胡正鹏 段炳昌 施本植

施惟达 贺圣达 崔运武 董云川 谢本书

主 编：张瑞才

副主编：张昌山

编 辑：马维聪 柴 伟 杨君凤

作者简介

谢本书，男，汉族，四川邛崃人，1936年生。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研究员，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历史研究》杂志编辑、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省社科联专职副主



席、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曾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云南历史学会会长，云南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云南省政协委员，昆明市政协文史顾问，云南省社科规划办主任，云南省志副总纂，云南省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云南中华周易研究会会长等职。出版著作60种（其中个人专著30种），发表文章500多篇，个人执笔在1000万字以上，成果多次获奖（其中省部级奖10项）。1989年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1996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英国剑桥国际人物传记中心“20世纪成就奖”，2006年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称号等。

总序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李纪恒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部承载责任与使命的好作品，必将是一部千古不朽的立言典范，也必将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传世教科书。千百年来特别是明代以来，许多贤人君子和名人大家在广袤的云岭大地耕耘、思考和写作，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和丰厚的作品，足以飨及后进，启迪晚辈。在搜集、遴选和整理云南明代以来学术大家、学术名家著作的基础上，由云南宣传部门牵头推出了《云南文库》，这一丛书的面世诚为云南学术研究和出版界之盛事。

编纂《云南文库》是传承云南地域文明、提高云南文化自觉的有益尝试。“七彩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有重要影响的古人类，造就了云南文化的丰厚积淀，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云南文化艺术宝库。作为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地，云南自古以来都不缺乏学贯中西的大师和博古通今的大家，从来都不缺乏魅力四射的光辉著作和壮美奇绝的文化遗存。其中，许多学术作品都凝聚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智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彰显了有云南自身特点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今

天，我们将历史长河中的明珠拾起，用心记载云南学术史上的灿烂篇章，正是为了守护云南优秀的地域文化，为了汲取进一步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养分和动力，进而筑牢云南文化自信的根基。

编纂《云南文库》是树立云南文化品牌、增强云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态文化、包容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百花园中一枝流光溢彩、香飘四海的奇葩。千百年来，云南学者中英奇瑰伟之士以及众多寓居云南的外省学者念兹在兹，深植于云南沃土，扎根于传统文化，不懈探索、勤奋撰述，留下了一批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珍贵成果。特别是抗战时期，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到来，昆明一时风云际会，云集了大批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学术大师和著名专家，云南成为当时中国学术中心之一，诞生了大批学术经典。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学术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学术成果日益丰硕，推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精品。近年来，《云南史料丛刊》《云南丛书》等一批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丛书相继刊印，云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今天，我们隆重推出《云南文库》，就是要为更多的人了解云南、熟悉云南、研究云南搭建一个平台和载体，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文史学术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在更广领域传播云南文化、打造云南品牌、增强云南软实力创造更好条件。

编纂《云南文库》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有效途径。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要用健康高雅的艺术、用智慧明辨的思想、用善良温厚的德行启迪人、引导人。编纂《云南文

库》一个重要目的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此次收入《云南文库》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民族、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知识，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阅读这些著作，有助于培育读者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发现、享用、珍惜世界和人生之美，能使大众的精神世界得以滋养和美化、人格得以陶冶和熏陶、心灵得以安顿和抚慰、情感得以丰富和升华，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审美需求。

编纂《云南文库》是推动云南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早在1996年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是全国最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之一。2000年，我省正式确立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三大目标，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范畴。2009年召开的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委会，作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重大决策，把云南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11月，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主题，要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云南人民正豪情满怀地沿着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道路阔步前行，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模式已经也必将进一步焕发动人而耀眼的光芒。我们将以打造《云南文库》等一批社科品牌和文化精品为契机，继承优良传统，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宏大眼光，锐意进

取，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更好地弘扬以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为主要内容的云南精神。

《云南文库》最终得以发行，首先是众位先贤心血和智慧结晶。在此，我们要对创造了云南学术精品并因此而为中华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云南文库》的编纂过程中，相关编纂单位、出版单位和参加整理的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兢兢业业地做好编校和出版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精心工作，才有如今的翰墨流芳。在此，我要诚恳地道一声，大家辛苦了！《云南文库》从构想走向现实，离不开众多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也一并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衷心希望同志们一如既往地云南文化建设献智献策，欢迎更多的同仁志士参与到云南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谨为序。

目 录

Contents

蔡锷与民初政局	1
三次广州政府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12
孙中山与刀安仁	
——孙中山文献与研究中不可有的缺失	29
《大众哲学》的历史定位	41
《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45
孙中山与云南	54
近代云南各族人民爱国主义斗争的特点	66
片马问题的考察与研究	76
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	
——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	93
护国文化	
——云南精神的典型代表	113
“五四”运动在昆明	138
西南军阀与西南地方实力派	153
中国远征军的远征与滇西抗战	175
论滇军	195
中国共产党领导昆明学生民主运动的历史回顾	208
红军长征过云南	217
抗战时期云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	230
西南联合大学与云南陆军讲武堂之比较研究	242
百年讲武堂的文化品位	253

丙班的辉煌	262
滇越铁路与昆明近代化	270
勇于革命 善于妥协 ——以云南辛亥起义为例	279
学术年表	294

蔡锷与民初政局

一、蔡锷是民初著名的风云人物

蔡锷将军于1916年（民国五年）11月8日去世，年仅34岁。他在民国初年仅仅生活了5年时间，然而正是这风云变幻的5年，使这位青年将军创造了奇迹，头角峥嵘，叱咤风云，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民国初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辛亥革命一度辉煌，随即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权，让人沮丧；护国战争再度辉煌，随即又为军阀割据与混战所取代，黯然失色。旧民主主义革命似乎没有了出路，革命者也感到了绝望，然而接着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民国初年，这是个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的关键时期。“乱世出英雄”，确实，在民国初年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混乱年代里，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混世魔王，而更多地则是出现了一大批救世英雄、爱国主义者。这批救世英雄，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单。胡耀邦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就提到了辛亥时期著名的风云人物，除孙中山外，还有陆皓东、郑士良、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蔡元培、胡汉民、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熊成基、刘静庵、詹大悲、张培爵、吴玉章、陈去病、柳亚子、居正、于右任、李烈钧、蔡锷、朱德、焦达峰、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续范亭、张奚若、

司徒美堂等30多人^①。这些人士中，除少数牺牲于辛亥革命前夕以外，大部分都曾活跃于民国初年的政坛上。蔡锷就在这批“救世英雄”、“辛亥著名风云人物”的名单之中。

蔡锷在民初政坛活跃的年代，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人们议论他的党派属性，是同盟会员，还是进步党员，或者是什么别的党派成员，或者是否倡导“不党主义”，争论至今并未完全结束。然而，本文作者看重的却不在于他形式上参加了什么党派，而是他事实上做了什么样的事，适应了什么样的要求，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就从这里说起。

二、蔡锷是民初政局发展过程中反映时代特征的指示器和坐标

在民初蔡锷生活的短短5年内，时间不长，却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在这几年的政坛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不可计数。择其要者有三：一是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二是袁世凯独裁与二次革命，三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护国战争。

蔡锷对这三件事所取的态度，发挥的作用，不论其功过如何，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特征的反映，因而使他成为这一时期反映时代特征的指示器和重要坐标。在一定意义上，蔡锷作为历史人物的重要性，恰巧是他身上所赋予的时代特征。

首先，蔡锷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我们可以用主张稳重，积极参与，最后创造奇迹几层意思来加以概括。早在蔡锷留学日本期间，虽然并未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羁绊，却已参与了革命派的活动，曾得到孙中山的接见，以“共商天下事，总理（孙中山）深得其助”^②。而且参与了邹容《革命军》一书的起草，《革命军》初名《腊肠书》也是蔡锷命名

^① 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0日。

^② 冯自由：《记沈云翔事略》，载《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页。

的^①。蔡锷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任职，对革命派有所同情和支持，因而有蔡锷加入同盟会之说。1911年初，蔡锷来到昆明，即对革命派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②所以被云南同盟会员认为是“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③。随后，蔡锷成为辛亥昆明起义的重要策划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一举夺得云南辛亥起义的胜利，使云南成为响应武昌起义的全国第四个省区、西南第一个省区。

辛亥后建立的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稳定了云南，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也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使云南成为民国初年各省军政府的榜样。这就是“辛亥之役，匕鬯不惊，而定大业。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饷，而滇中晏然”。蔡锷治滇，“英、法尤敬畏”，并称“若蔡公者，当今第一”^④。这并非一时奉承之虚语，而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云南辛亥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为云南实现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也对云南后来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年以后，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目的的护国战争，首先爆发在云南，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次，蔡锷对于二次革命的态度，我们可以用追求安定、维护国权、反对动乱，结果走上拥袁的道路几层意思来加以说明。辛亥以后，蔡锷本其追求“爱国”之初衷，主张国家应当尽快稳定，以便腾出手来从事建设，所以他主张维护“国权”。他认为“共和政府”（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都包括在内），如“初产婴儿”，应加以很好爱护^⑤。

当袁世凯独裁卖国，屠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事件发生，导致孙

①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9页。

② 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

③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④ 蒋百里：《蔡公行状略》，《长沙日报》1916年12月26日；转见《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3页。

⑤ 《复粤都督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中山领导“二次革命”爆发之时，蔡锷仍以维护“国权”为前提，主张法律解决，“力持镇定”，反对军人干预^①。战争爆发，蔡锷仍表示反对，甚至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要袁“早日扑灭”革命^②。还派滇军参与组织所谓以唐继尧为总司令的“滇黔联军”，出兵四川，攻打响应二次革命的熊克武部。只是滇军进入四川后，熊克武已失败逃走，这才避免了滇军与熊克武部的直接冲突。

蔡锷在二次革命中，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似乎难以理解。然而，它却从一个侧面深刻地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动乱以后，人们普遍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建设自己的祖国，反对外来的侵略。辛亥后革命派的舆论机关报《民立报》也曾载文说，辛亥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所以“一闻变起，心惊胆裂”。“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③蔡锷更认为：辛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破坏”^④。战争爆发后，进步党认为，这“并非反抗一、二私人，乃反对我中华民国”^⑤。这是一种误解，却又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所以有学者指出：“在1913年，中国人民对和平、法制和社会秩序安定的渴望，超过了其他一切。”^⑥加上袁世凯的面貌尚未完全暴露，他毕竟是刚建立不久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人们对他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最后，蔡锷对护国战争的态度，我们可以用积极参与、巧施智慧、坚韧不拔，最后光荣献身几层意思来加以概括。当袁世凯帝制自为公开化以后，蔡锷从拥袁转向了反袁的立场。这绝不能单纯用“投机”来加以解释，因为隐藏在这种转变背后的，仍然是蔡锷一以贯之的“爱国”思想为其出发点的。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出笼，以及为帝制制造舆论的“筹安会”的公开化，不能不给蔡锷以巨大的刺激，他醒悟到：“袁氏

① 《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0、683、686页。

② 《蔡锷致北京政府电》，载《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169页。

③ 《民立报》1913年6月1日。

④ 《复谭延闿等电》，载《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3页。

⑤ 《进步党主张戡乱电》，载《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4页。

⑥ [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叛逆，以致强邻生心，内乱潜滋。际此千钧一发之会，吾侪乃不得不负重而趋。”^① 为了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②。他在袁世凯的眼皮底下，巧施智慧，开展了巧妙而又积极的反袁活动，使得以狡诈著称的袁世凯也显得笨拙起来，所以在外国人的眼里就成了：“蔡锷将军与袁世凯先生比，无疑是聪明得多的人。”^③ 蔡锷冲破了禁区，最后逃出北京，经日本、香港等地，来到云南，参与发动和领导反袁护国战争。这样的经历，比之三国时代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其惊险程度不知超过了若干倍”^④。

在护国战争酝酿、发动以及战争过程中，蔡锷都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物。由于他曾是梁启超的学生，有师生之谊，与进步党有着亲密关系；他与黄兴是湖南老乡，与孙中山、黄兴都保持着交往和友谊；他长期在南方军界任职，还曾任辛亥云南都督，与云南和西南地区军政要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在北京任要职，与北洋派某些军政人士亦有联系；甚至他与复辟派的要人康有为（他的老师的老师）也有书信来往。蔡锷如此特殊的难以取代的地位和关系，使他成为护国反袁大联合的纽带和桥梁，成为反袁护国战争的旗帜，从而得到“整个西部的老百姓普遍地爱戴”^⑤。

蔡锷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反袁护国战争，不顾自己“瘦得像鬼”、“命在旦夕”的疾病纠缠^⑥，与数倍于己的敌人相拼，出生入死，坚韧不拔，指挥和战斗在第一线，使袁世凯最后“卒毙于护国军一击之余”^⑦，终于取得了护国战争的胜利。而蔡锷本人则在护国战争结束不久，即因久病不治，心力交瘁，劳累过度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蔡锷在民初5年中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局变化，对辛亥、护国的积极

① 《致雷颺电》，载《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页。

②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9页。

③ [澳]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32页。

④ 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页。

⑤ [澳]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33页。

⑥ [美]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⑦ 《护国岩铭》，载《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6页。

态度和献身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对二次革命所持的消极和反对态度，是令人惋惜的，却又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统一在蔡锷一个人身上，是一种矛盾现象，然而这却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三、蔡锷在民初的活动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云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蔡锷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其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形象，主要是由两件业绩奠定的。一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了云南反清起义，并在领导辛亥云南军政府时，进行了一系列有成效的改革；二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发起、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并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件事都和云南不可分割，蔡锷因而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蔡锷先后在云南的时间仅3年左右，而他的主要历史功绩，却几乎全是在云南奠定的，云南成了蔡锷的“第二故乡”。

蔡锷一生中，曾两次来云南。第一次是1911年3月到1913年9月，约两年半的时间。他到云南之初，等待就任新职之时，即抓紧时间，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附以按语，写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成为与兵书经典《孙子兵法》等并列的、中国近代及其以前的“十大兵书”之一，也是民国时期黄埔军校必读的兵书之一。这是蔡锷之所以成为军事学家的**重要兵学著作**。

1911年7月，蔡锷被清廷任命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这是辛亥起义前夜了。他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却“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①。辛亥昆明起义前夕，云南革命派召开准备起义的五次秘密会议中，蔡锷参与了四次，并担任了起义军临时总指挥。1911年10月30日昆明起义爆发，蔡锷号召“同起义军，革命清廷”^②，一举夺取武装革命的

① 《辛亥革命回忆》，载《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9页。

②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